

中日网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gt; 研究专题 &gt; 靖国神社 &gt; 论文

## 从日本宗教文化角度看靖国神社问题

发布时间: 2006-04-12

点击次数: 1664

作者: 刘江永

## 一、靖国神社问题与所谓“日本文化特殊”论

日本于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1869年建立了东京招魂社。1874年日本首次出兵台湾,1879年霸占琉球。同年,在明治天皇倡议下,东京招魂社改称靖国神社。从此,靖国神社中祭祀的主要是日本对外战争中的阵亡者,成为日本军部动员侵略战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当时,日本的神道被升格为凌驾一切其他宗教之上的所谓国家神道。靖国神社作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所特有的宗教设施,其宗旨是将“为国捐躯之人”集体供奉为“靖国之神”和“英灵”,永久祭祀,“万代显彰”。

甲午战争后,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曾于1895年11月14日写道:“必须给阵亡者及其遗族最大之光荣,使其体会到战死沙场之无限幸福”。为此,“恳请大元帅陛下作为主祭者亲临现场(笔者注:靖国神社),颁布?语为死者功勋显彰,告慰其英灵,并招待全国的阵亡者遗族,赐予他们亲临现场之殊荣”。(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下简称“二战”),靖国神社曾作为军部设施直接隶属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管辖。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靖国神社的主持人——“宫司”曾由陆军大将铃木孝雄亲自担任。当时,靖国神社作为军国神社确实发挥过麻醉和刺激日本国民参战的精神鸦片作用。截至2002年10月,靖国神社合祀着2 466 427个亡灵(2),其中死于二战期间的占94.8%,包括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部分台湾原住民和韩国人,而大多是侵华日军亡灵。

二战后,靖国神社的性质发生一定变化。随着日本国家政体的变化,军国主义遭到日本人民的唾弃,根据战后日本宪法的规定,实行政教分离。从此,靖国神社不再享有受国家管辖的特殊地位。然而,日本右翼势力一直企图恢复靖国神社在历史上的那种特殊地位。一些人为绕开违反宪法之嫌,宁肯把神道说成是日本的习俗和文化而非宗教。自民党从1969年至1974年先后五次向国会提出“靖国神社法案”,企图通过排除宗教性,把靖国神社作为“特殊法人”来实现“国营化”,但均被否决。于是,他们便企图通过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并使其制度化,以实现既定政治目标。1978年10月17日,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永野修身、木村兵太郎、武藤章、松冈洋右、东乡茂德、白鸟敏夫等14名日本甲级战犯,经厚生省批准被作为“昭和殉难者”载入“雨亚 簿”,秘密合祀于靖国神社。此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便引起日本国内更大争议和邻国强烈反对。以上便是所谓靖国神社问题的本质和由来。

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邻国人民的感情,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个症结。针对来自中国等亚洲邻国的谴责,日本一些政客和官员总是强调日本文化与习俗的特殊性,日中两国的生死观不同。他们的说辞是:中国人认为如果生前做坏事,死后应遭唾骂。杭州岳庙前谋害岳飞的奸臣秦桧跪像就是典型,而日本人则认为“人亡不究魂之过”,在日本文化习俗中亡灵是不分善恶的。他们还列举日本人曾为足利时代的逆贼楠木正成等人建立神社,为入侵的元朝军队将士立碑,为日俄战争中战死的俄军将领立碑等等,以作论据。[1](P40-45)日本前防卫厅长官瓦力等人宣扬,日本的理念“死者不鞭尸,不挖墓”。他甚至认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包含了日本所有文化、传统、习俗的国家应有状态。从广义上讲,可以说是日本文化。日本人承认灵魂的存在,与慰灵和镇魂相伴而生”;“在靖国神社祭祀英灵,是根据日本古来习俗——祖灵信仰、御灵信仰,已成为日本文化”;“为战死将士慰灵表彰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礼仪”;“作为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理所当然”。[2](P24-31)这种说法,完全不顾日本帝国曾经与纳粹德国一起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史实,毫无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之

意。

上述说法目前在日本一些人中仍相当流行,听起来似是而非,实则根本站不住脚。日本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善于吸收他国文化之长,同时保留自身的传统特色。从历史沿革看,靖国神社并不等于日本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而只是在明治维新后被军国主义所利用的国家神道的产物,曾构成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日本政府便谎称,神道不是宗教而是日本自古以来的习俗,迫使所有日本人都来尊崇。现在的问题在于,日本一些人不仅不痛改前非,反而有意无意地继承了当年的军国主义邪说,用所谓日本文化特殊论来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辩解。岂不知,这只会适得其反,不仅无助于增进国际理解,反而会加深国际误解,损害日本的国际形象,甚至使人感到日本传统文化就是军国主义文化。其次,所谓“亡者皆成佛”之说,很容易使人感到日本的宗教文化习俗对生者是没有约束的,无论犯罪还是加害于人都无所谓,反正“人亡不究魂之过”。

## 二、日本宗教文化中对亡魂有善恶之分

神道教是唯一产生于日本本土的宗教信仰。到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84年),神道教发展为皇室和国家一级有组织的宗教。[3](P112)明治维新后,神道教成为日本的国教。二战后,神道教失去了这一地位,成为日本国民可以自由选择宗教信仰。日本人每逢新年在各地神社参拜已成为传统习俗。统一的参拜形式是“两拜——两拍手——再一拜”。据说“两拜”表示对“神”的拜谒,“两拍手”表示接受“神”的回应,“再一拜”表示对“神”的感谢。

据日本权威工具书《日本宗教事典》解释,在日本神道传统观念中,关于灵魂的概念自古以来大体分为两种,即“和魂”与“荒魂”。前者可带来安宁;后者则会带来灾厄。人们通过祭祀“荒魂”,即“镇魂”,祈祷“荒魂”转化为“和魂”。[4](P612)此外,关于天皇家族还有所谓“尊灵”、“圣灵”之说。在“御灵信仰”中,“镇魂”是侧重于镇慑“荒魂”,而“慰灵”则是源于对“祖灵”的慰藉。所谓“祖灵”,不是指一般意义上家庭祖先之灵,而是包括先祖和先亡者的所有亡灵。在古代,作为日本民间的“祖灵信仰”,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先祖之灵将与“祖灵”融合,往来于现实,随时注视呵护着子孙。日本所谓新年的“年神”即是“祖灵”的化身。现代日本社会受佛教影响,葬礼通常更重视追悼家人,“祖灵”的意识相对淡化。

日本关于“神”的概念也分两种,即“善神”与“恶神”。[4](P616)前者是与“和魂”、“祖灵”相通的平安之神;后者则是与“荒魂”、“怨灵”,即因战乱、瘟疫、灾害等丧生者之灵相通的鬼怪幽灵。在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中,给人间带来灾害厄运的“恶神”包括所谓“厄病神”、“贫穷神”等,它们都是作为“荒魂”而存在的,必须通过某种“镇魂”仪式才能驱邪免灾,日本称为“镇送攘灾”。这是因为,在日本神道教的观念中,通过镇祀,“恶神”可以被驱逐出现世,转化为“善神”或“福神”。例如,日本民间认为,瘟神之最的“牛头大王”得到祭祀后即可送瘟神,成新神,发挥避免瘟疫的“灵力”。日本的“祀园祭”也是源于在海边驱除“恶神”的民间习俗。同样,如果对“祖灵”、“福神”的祭祀有所怠慢,它们就会变为“怨灵”、“恶神”。[4](P618)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辩证思维与日本宗教观念相结合,多少反映出日本人为何要祭奠“荒魂”、“恶神”的思维逻辑和内心世界。

日本宗教文化对亡灵历来有所区分。日本著名哲学家、日本文化论的权威学者梅原猛明确指出:“靖国神社远远脱离了传统的神道。若将古事记的神道作为传统,可以认为古事记中系由两种神社构成:一是祭祀自己先祖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二是祭祀天照大神子孙所消灭的大国主命的出云大社。而且反而是出云大社建造得更大。将为自己夺权而消灭的人们镇魂的神社,比自己祖坟修建得更大,这才是日本的传统。”梅原猛指出:“中国和韩国等日本侵略战争的牺牲者比日本的牺牲者多5倍”,“按传统的日本神道,这些人的灵魂也应祭祀。不对这些人慰灵,而只祭祀本国死者难道不是很奇怪的吗?这是违反传统神道的”。[5](P72-78)因为根据日本的传统,若不祭祀对方的战死者,其亡灵就会变为“怨灵”而作祟于现世。

即便是拥护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大原康男也承认,日本宗教观念和祭祀场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自所谓“御灵信仰”的“镇魂”,即日本人相信人亡之后有灵魂,由于担心敌方亡灵作祟带来灾祸,为了转祸为福而设立的“镇魂”祭奠场所。这是出自对战争中失败的敌方、被处死的罪魁祸首等幽灵的强烈畏惧所进行的祭祀,不等于把祭祀的对象作为值得纪念的英烈。第二类是所谓“祭祀英灵”的“慰灵”,即为追悼和表彰“为国捐躯”的将士而设立的祭奠场所。靖国神社便属于这一类。[1](P40-45)图1也许可以反映出这种比较特殊而复杂的宗教文化观念的结构。

就主动给敌军阵亡者建墓立碑这一点而言,中日之间的确有所不同,但并不等于日本对亡灵不分善恶。从历史上看,靖国神社本身就是明治政府为祭祀为明治维新建功立业的“英灵”修建的,靖国神社的正殿只祭祀为日本政府作战而丧生的特定军人和军属等。当时日本内战中属于德川幕府阵营的战死者是被排斥在外的。在西南战

争中对抗过明治政府的西乡隆盛,也未被放入靖国神社祭祀。另外,二战期间因临阵脱逃而遭枪决的日本官兵的亡灵,也不能作为靖国神社的“英灵”来供奉。[6](P97-103)在靖国神社院内,靖国神社正殿的旁边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金真?社”。“金真?社”是1965年创建的,其中不分国籍地供奉着正殿中没有供奉的世界各地战争阵亡者的亡灵。它或许体现了日本传统神道中“镇魂”的观念。这说明靖国神社本身就没有对死者一视同仁,而是有严格区别的。日本将东条英机等战犯作为“昭和殉难者”载入“?簿”,供奉在靖国神社的正殿,显然是要把他们作为“为国捐躯”的“英灵”来彰显。这除了体现着日本战前的价值观、战争观和历史观之外,难道还能做其他任何解释吗?

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曾计划另建悼念设施,以取代日本领导人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但遭右翼势力反对而搁浅。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恳谈会”报告明确提出:“在损害日本和平与独立、违反国际和平理念的人之中,即便出现死者,也不能成为这一设施中追悼的对象”。[7](P20-22)这再度证明,即使是现在,日本对故去之人照样是有敌我、善恶之分的。

由此可见,上述瓦力先生所谓“人亡不究魂之过”、“死者不鞭尸,不挖墓”的说法只反映了日本文化宗教中对“荒魂”、“恶神”也要祭祀,即“镇魂”的观念,但若用来说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正当性”,却难免有自欺欺人之嫌。靖国神社迄今只有130多年的历史,它通过国家神道等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似乎已使几代日本人的观念脱离了真正意义上日本的传统宗教文化。在笔者迄今接触的日本人当中,包括80多岁的退休教授等文化人都不知道神道的观念中还有“善神”与“恶神”之说,当然也不可能正确读出这些日语单词的发音。这说明,正是靖国神社和国家神道阻断了日本传统宗教文化的传承。如今,一些人出于美化侵略历史的政治需要而把靖国神社鼓吹为“传统文化”并继续误导民众,这难道不是对日本传统宗教文化的亵渎吗?看来,日本要解决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历史认知问题,也许需要来一场“文化维新”,对日本传统宗教文化进行再认识,彻底清除军国主义宗教文化余毒。

### 三、日本传统宗教文化没有靖国神社的位置

日本人受佛教和神道的影响,对灵魂有特殊的观念,并敬畏祖先。日本农村家庭中80%以上、城市家庭50%以上设有佛龕或佛坛,祭祀去世的父母先辈。日本人平时出远门、回到家中或有什么大事,总习惯到佛龕或佛坛前,合掌闭目,与故去先祖做心灵沟通并求保佑。日本《家训》一书中称:“怠慢了先祖,先祖之魂灵将作祟,使各种灾害不断,身、家、子孙都面临危险。”(3)要避免灾害,只有“不怠祭之”。“尊敬祖先是我国风之美所在”,“故一家大事必先奉告祖先而后行”。(4)战后初期,柳田国男在《先祖的话》一书中教诲日本人:“日本历来最深层的宗教感情是死者在国家周围守候,盯着生者。生者对死者,无论作为国家、自治体、还是家庭,都要每年反复祭奠、安抚。特别是有许多没有子孙而亡的年轻人,这些人的灵魂如果只托付家庭祭奠,早晚会绝迹,由于没有人祭奠,所以必须考虑其他途径。这对于日本文化的持续,是无比重要的”。(5)

然而,这并不等于靖国神社是日本的传统宗教文化,也不等于日本人必然会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由于,靖国神社只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宗教文化传统的产物,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没有直接的关系。日本传统神道的宗教信仰是一草一木皆为神,只是到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才形成“国家神道”、“靖国神道”的。它与明治初年日本的“废佛毁释”,即排“佛”崇“神”有关。当时,连古代空海大师完成的佛神合一的“修验道”也受到禁止。取而代之的是把国家和天皇奉为神的国家神道。这种日本近代的“国家神道”来源于统治集团发动对外战争的政治需要。二战后,国家神道遭到彻底否定,而小泉首相上台后却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尽管日本有识之士反复规劝小泉,促使其了解何为日本宗教传统,但小泉根本不听,反而更加变本加厉,被日本知识界名流视为“战后最差的首相”。[5](P72-78)

实际上,许多日本人只是在自己家中祭祀先祖,根本不理靖国神社,包括战争遗属在内的部分日本人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例如,日本和平遗族会的成员就痛恨夺去他们父兄生命的日本军国主义,反对首相参拜并再度把靖国神社作为凝聚日本民族认同的政治工具。在日本国内,围绕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斗争从未止息。《朝日新闻》等媒体对小泉参拜便持批评态度。日本一些民众接连状告小泉首相“公式”参拜靖国神社违反宪法“政教分离”原则。部分日本人把在靖国神社祭祀自己的父辈看作是一种侮辱,因为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日共、社民党坚决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党首冈田克也表示,他不赞成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因为来自中、韩等国的外来压力,而是他觉得作为一个日本人不应该去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地方,他不赞成靖国神社的战争观。(6)最近,日本执政党内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呼声也在高涨。一些人主要是从对外关系的角度强调首相今年不应参拜。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公明党代表神崎武法表示,若小泉首相坚持参拜,将影响联合执政的基础。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宫泽喜一、日中友好议员

联盟会长高村正彦等人也奉劝小泉首相停止参拜。甚至连一些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的国会议员,例如,遗族会会长古贺诚等人也表示希望小泉首相慎重行事。

日本对华友好人士的眼睛更是雪亮的。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便明确指出:靖国神社既不是日本历史,也不是日本文化,完全是日本一小部分政治家手中的一张“政治牌”。靖国神社是明治维新以来才有的,它不属于日本国民,不属于日本历史,也不是日本的文化,只是日本一小部分政治家的作秀。靖国神社不仅制造了假神,崇拜战争,造成宗教上的混乱,而且篡改历史,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神社内供奉的246万多尊所谓“神”,还有战后受到审判的1 068个战犯,都是在一系列非正义的战争中为天皇、财阀和法西斯军国主义卖命而死的人,岂能把他们偶像化、当作神来顶礼膜拜呢?尤其是神社内的“?就馆”,那是一个全面肯定日本历次侵略战争的展览馆,影响极坏,因此,说靖国神社是战争神社恰如其分。[8]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认为,“即便日本的生死观有其特殊性,在国际上也是行不通的。”(7)假设德国领导人以同样的理由或类似方式祭祀希特勒,国际社会都是不会允许的;“人亡不究魂之过”的遁词在国际上是很难得到理解的。因此,日本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取得邻国的尊重与信赖,就不能违背国际通行的惯例和大多数国家的普世性价值观而一意孤行。

#### 四、日本宗教文化中妨碍正确认识历史的因素

正如中国文化部前副部长刘德有指出的:“日本文化特殊论”的种种表现,是由于日本战后没有彻底总结和清算过去的侵略历史。“这个问题拖了一个很长的尾巴”,“是有其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背景的”。[9](P1-3)

(一)日本个人感情和宗教观念比较复杂。如图1示,如果要求他们就参与对外战争父辈只是在“和魂”或“荒魂”、“慰灵”或“镇魂”之间做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便可能出现困惑。日本宗教与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兼容性。在日本的宗教观念中,同一神也会存在善与恶两种要素,只要祭祀,便可去恶成善,否则善会变恶。日本在形式上把“慰灵”和“镇魂”两者分别放在一处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例如,在祭祀松井石根的日本热海市伊豆山观音堂内,除了存放有松井部下战死者23 104人的名册外,还分别立有所谓“支那事变”日中双方“战死者灵位”。[10](P1-2)这表面似乎照顾到中日双方的“战死者”,实则掩盖了战争性质,抹杀了日本侵华罪行,增加了祭奠甲级战犯的所谓“正当性”。在这种场合,前往参拜的日本人在内心深处仍可对不同的对象产生“慰灵”或“镇魂”两种不同的理解或内心感受。这也许就是日本一些人所说的参拜是“内心”的问题,各自会有不同。但即便如此,靖国神社的性质也决定了其正殿中不可能并列供奉与日本作战国家阵亡者的亡灵的。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从神道观念还是从政治立场来说,日本都是有严格区分和价值判断的。

(二)日本人的忠孝观念与中国不尽相同。了解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一些日本人比较容易受到右翼邪说的蛊惑。受中国儒学影响,忠孝观念在日本根深蒂固,被作为广泛肯定的价值观。中日两国的不同之处是,即便是在封建社会,中国讲忠孝也是有条件的,即在忠孝之上还有一个“仁”的观念。针对罪恶不仁之举而大义灭亲,在中国可以受到称道,而在日本则是难以想象的。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忠孝观与“报恩观”相融合,更加绝对化、无条件化、“义务化”。在过去,“忠”就是无条件地绝对效忠天皇,现在则是效忠于所属的单位、公司或团体。

“孝”则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无条件地对父辈祖先尽孝,终生感谢养育之恩。19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曾提出所谓“忠孝一致”,后来发展为“君臣一体”、“忠孝一本”[11](P444),绝对效忠天皇的“忠君爱国”思想,成为日本动员国民投入对外战争的重要精神支柱。

美国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花与刀》中指出,过去,日本人的“义务”分为两种:对父母之“恩”的报答,即“孝”;对天皇之“恩”的报答,即“忠”。“这两种形式的‘义务’都是无条件的。日本人把这些德绝对化,从而背离了中国人关于对国家的义务和孝行的概念。自七世纪以来日本不断反复地吸收中国的伦理体系;‘忠’和‘孝’这些词都是汉语,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德视为无条件的。中国设定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德作为忠与孝的条件。这个德即是‘仁’,通常被译成‘benevolence’,但它几乎意味着西方人在说良好的人际关系时所意指的一切。父母必须有仁。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他的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一个人的效忠是以仁这个条件为基础的。天子能否永据皇位,文武百官能否永占官职,均取决于他们是否施行仁政。中国人的伦理把这块试金石应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12](P93)二战前日本著名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历史上中日两国这种观念差别时也认为:“在日本,这些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即使作为学说也从来没有被完全接受过。事实上在日本‘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德,完全没有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占的那种崇高地位。”(8)

今天,即便一些日本人从总体上认为那场争是错误的,但往往仍会把自家参战身亡的先祖奉为“英灵”或“慰灵”的对象,而不会作为“荒魂”或“镇魂”的对象。正因如此,日本遗族会成员才希望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对

此,即便作为个人感情可以理解,但若众多个人形成同一种思维定式,那么,从总体上有可能形成对过去侵略战争的肯定。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很容易使一些人从抽象否定而具体肯定过去的战争变为全面肯定过去的战争,或者表面否定而内心肯定过去的战争,对外否定而对内肯定过去的战争。

(三) 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日本战争遗属才能摆脱宗教文化方面的精神困惑。目前,日本国内围绕靖国神社问题的斗争激烈。一些人参拜靖国神社是为悼念亲属、战友亡灵,获得自身心灵安慰,未必是要复活军国主义。一些人则把明治以来的战死者当作“为保卫国家和同胞而牺牲”的“英灵”来追悼,借以振奋当代日本人的“爱国心”与国家认同意识。一些人提出将甲级战犯的亡灵移出靖国神社,而靖国神社及甲级战犯家属则反对,宣称所谓亡灵一旦合祀就无法分开。一些人继续强调,从历史沿革看,即使将甲级战犯分离出去,也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场斗争不仅涉及如何认识历史,而且关系到日本的前途。

历史事实证明,对日本来说,靖国神社不仅未能靖国安民,反而祸国殃民。靖国神社与其他神社不同,它具有“可后续性”,即只要是战争中丧生的日本军人便可不断合祀其中。日本经历了战后60年的和平时期,而未来如果自卫队在海外作战身亡也作为“英灵”放入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会否再度发挥历史上那种鼓励军人出征的作用,不能不引起日本爱好和平的人们和亚洲各国人民的警惕。日本人要摆脱上述精神和感情世界的困境,唯一的出路也许就是像日本“和平遗族会”所做的那样:把靖国神社视为加害于自己先祖和日本国民的精神枷锁而彻底摒弃。认清自己的先祖是受到军国主义驱使才成为战场上的“怨魂”,而不是所谓大日本帝国的“英灵”,因此或许只能在各自的家庭祭奠,不忘历史悲剧,祈祷永久和平。

注释:

- (1) 转引自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亚洲观》,孙卫东、徐伟桥、丘海永译,张碧清校,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8月版,第126页。
- (2) 靖国神社内没有亡者的骨灰或牌位。所谓合祀,是把新亡灵的名字载入“雨亚 簿(灵玺簿)”,进行招魂后,使亡灵统一到靖国神社正殿,即完成入灵合祀仪式。合祀仪式通常在每年秋季大祭(10月17—20日)的第一天举行。“雨亚 簿”平时存放在靖国神社正殿后面的“雨亚 簿泰安殿”内。
- (3) 《伊势贞长家训》,第一劝业银行经营中心编:《家训》,东京:中经出版社,1979年版,第229页;转引自李卓著《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
- (4) 转引自李卓著《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页。
- (5) 转引自森田次夫《从遗族看靖国问题》,载《自由民主》(月刊)2002年第8期,第32-39页。
- (6) 参见日本记者俱乐部主持的“党首讨论会”纪要,《朝日新闻》2005年8月30日第13版。
- (7) 2004年10月15日,日本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在中日友好协会举行座谈会上的发言,笔者应邀出席。
- (8) 转引自鲁斯·本尼迪克特著《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孙志民、马小鹤、朱理盛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参考文献:

- [1] 大原康男. 日本人与靖国神社[J]. 自由民主(自民党机关刊物),2002,(8).
- [2] 瓦力. 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的文化、习俗[J]. 自由民主(自民党机关刊物),2002,(8).
- [3] 讲谈社国际株式会社. 日本之窗[M]. 东京,纽约,伦敦:讲谈社国际株式会社,2004.
- [4] 日本宗教事典编辑委员会. 日本宗教事典[M]. 东京:弘文堂,1985.
- [5] 梅原猛. 靖国神社远远脱离传统的神道[J]. 世界,2004,(9).
- [6] 赤泽史朗. 如何思考战殁者追悼与靖国神社问题[J]. 世界,2004,(5).
- [7] 思考用于追悼、祈祷的和平纪念碑等纪念设施的恳谈会报告[J]. 新国策(半月刊),2003-02-15.
- [8] 朱成山. 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靖国神社造假神是战争神社[EB/OL]. <http://cn.news.yahoo.com/050331/72/2afq7.html>.
- [9] 刘德有. 所谓“日本文化特殊”[J]. 日本学刊,2003,(2).

[10] 蒋立峰. 甲级战犯与观世音[J]. 日本学刊. 2004 ,(4) .

[11] 藤田东湖. 弘道馆记述卷下[A]. 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户学[M]. 东京:岩波书店,1978.

[12] 鲁斯·本尼迪克特.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M]. 孙志民,马小鹤,朱理盛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5 期第20 卷 编辑:曹燕)

版权所有: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  
2004年12月13日创建